



美国汉学家牟复礼：独具中国气派的文史研究者

□ 郝良华 曲晓萌

弗雷德里克·W.莫特（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年），汉名牟复礼，美国儒学学者、汉学家、中国学家、东亚学家。牟复礼中的“复礼”二字来自《论语》中的“克己复礼”。牟复礼曾师从赵元任学习汉语，1944年考入金陵大学历史学系，随王崇武研读明史，1969年创办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经过数十年耕耘，使该系成为北美汉学人才济济的一方雄镇。虽然牟复礼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史学家，作为中国近世史研究的一流学者，他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向来是采取文史不分家的态度。凭借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学力深固的敏锐触感和史学家训练有素的深邃眼光，牟复礼在其经典著作——《中国思想之渊源》一书中提出并使用了“伟大传统”这一重要概念。也正由于此，他和当时强调科学化的正统西洋史学取径不同，时人提到牟复礼时总是称他为中国文史专家，而不称其为历史学家。这一词之差恰恰体现出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以其精纯的文化修养、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为北美中国文史研究开创出一片独具中国气派的学术天地。

（一）

牟复礼1922年6月2日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牟复礼在大学一年级时，学校要求学生都要学习一门亚洲语言，牟复礼选了中文。那时他所学的汉语口语还很粗浅，但由此喜欢上了汉字，从此与中国文化结缘。后来牟复礼入伍当兵，因为学过一点点中文，被送去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语言训练中心的汉语培训班，接受赵元任设计主持的一年强化语言训练。这一培训班为北美培养了许多极重要的汉学家，而牟复礼在班上的学习成绩是第一名。崔瑞德认为牟复礼是他见过最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文说得最为标准典雅的西方人。牟复礼在抗战后期以美军联络员身份来到中国，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罪行准

（上接1版）

找准找实公安机关开展主题教育的方法路径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加强研究谋划，找准找实公安机关开展主题教育的方法路径，推动公安工作提档升级、全面发展。

从对标对表中找方法找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出席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亲自为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重要训词，就新时代公安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新时代公安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公安机关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开展主题教育的必修课、常修课，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严格对标对表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确保公安机关始终沿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从服务发展中找方法找路径。公安机关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围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这

备材料。他从成都到南京，再到晋察冀边区，再到北平，所接触的都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中国学者。他先后在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学习，听过包括向达、启功等先生的课，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学者是明史专家王崇武。牟复礼自己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那块土地随处传来的笑声，他开始理解这些平和友善、聪慧谦逊的人们，是如何在战争的艰难岁月里生存下来，如何对付危机、承受冻饿，在长期的困苦中始终保持乐观。在那时他便决定，战争结束生活恢复正常之后，一定要研究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种种笑声长留耳际，中国的训诂传统常自温习，是牟复礼毕生治中国史的两股源头活水。

（二）

牟复礼年轻时决定到金陵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研读中国历史，为的是求知；他中年时下决心翻译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是为了求知。牟复礼在这本书的“译者序”中说：“这项翻译工作对我来说，是一门持续进行的学习中国哲学、历史经典及西方概念和方法的严峻课程。我最初要翻译此书的动机是想在（萧公权）这位大师的指导下获得这样的训练：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谁不愿意有如此激励人、如此有收获、如此给人无尽喜悦的经验呢？”对此书的翻译是他对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牟复礼毕生以求知为志业，从“求知”的立场，牟复礼记述、批判当年美国高等学府对中国研究的歧视，特别反感西方学界强不知以为知的傲慢，因此毕生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牟复礼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本书《中国思想之渊源》，是给本科生谈的先秦诸子思想介绍。100多页的短篇幅，不过10万字，但却高屋建瓴、简明精微，对儒家名墨的特色和交互关系的阐述既清楚又观点独到。如评价孔子“既凡而圣，真乃人类最稀罕之成就”；指出孟子具有“张扬的

天性、激越的性格、豁达的精神”；《道德经》“如同给中国文化施了咒语，其魅力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等等。其笔锋带着同情的幽默，直到现在都是西方大学里中国思想史课的基本读物之一，也是西方学界公认的介绍中国古代思想渊源的经典之作。

（三）

50年代中期以前，普林斯顿大学还没有独立的东亚研究系，更谈不上有全方位的中国文史研究。牟复礼1956年受聘到该校东方学系后，开始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1969年，东亚学系正式成立，不久便成为北美的东亚学，尤其中国近世历史、文学研究以及中国语言教学的重镇。牟复礼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的创业筚路蓝缕，他一生所撰写、翻译、编纂的50多种专著、论文和长篇书评，遍及中国古代思想以及中国近世政治、社会、文化、艺术各个领域。这些著说，通中西之见，会文史于一，衡情物，据事说理，有深邃的洞见，有细致的考证，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培养新知，开启研究门路，擢升学术水平，胸怀博大而功力深厚。牟复礼也极为重视中国典籍在汉学研究中的支撑地位。虽然葛斯德图书馆在牟复礼任教之前就已是收藏中国文史珍本善本最有名的中心之一，但整体的图书收藏远不及哈佛燕京等其他老牌图书馆。这种情况在其任教期间得到了完全的改观，葛斯德图书馆中国文史方面书籍的收藏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到他荣退之时，藏书的完整和丰富都已举世公认了。

（四）

牟复礼敬爱他的老师，是终生之事，除了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尊崇感谢之意，有机会时也总会提及他们。比如，南京时代的王崇武，是引领牟复礼踏入明史研究领域的老师。牟复礼

在1962年出版了第一本专著《诗人高启》，便向这位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致上缅怀之意。他翻译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此书能在萧公权有生之年出版献给老师，内心甚感快慰。牟复礼的治学态度和基本方法，也和萧公权颇有神似。萧公权曾应牟复礼之请而作的治学座右铭曰：“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牟复礼庶几肖之。牟复礼对于后辈和学生的帮助和爱护，集经师与人师于一身，颇有中国古代恂恂君子之风。牟复礼的夫人陈效兰，是江苏泰州人，多才多艺，制得一手好陶瓷。当年牟复礼为了让东亚系的研究生有一个讨论研究心得的场合，特地创办了一个每周一次的茶会。茶会的名字叫“Cracked Pot”，字面意思是“有裂缝的茶壶”。茶会所用的茶壶正是出于其夫人之手，上面的确有一道裂痕。但其名之所以起得很贴切，是因为英文中“Cracked Pot”还有另一层意思，是指“痴狂之人”。此名用来形容研究生初生之犊的无畏精神和醉心汉学的执着精神，可谓妙语双关，且富有禅意。他晚年荣退之后，身体长期病痛，但旷达乐观，意志力强，而且风趣洒脱，给人的印象永远是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看不出是位经常要和病症抗争的人。牟复礼一生酷嗜古典音乐，就在他每年像候鸟般开车来往于科罗拉多的小羊山与普林斯顿时，有一回车子滑入一个小山坳，但他仍坚持听完某一个精彩的钢琴段落，才下车处理这个小危机。他一生学习中国文化，欣赏之、同情之、体会之，在行为上表现之，向世人昭示：德不孤，必有邻；能过化，必存神；无响不应，有教必宣。



观，整合各类力量资源和策略手段，健全高效顺畅的工作协调机制、先发制敌的专门工作体系、合成作战的工作格局，坚决捍卫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紧紧依靠党委领导，推动健全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构建从事后反应、被动应对转向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维护稳定工作体系。坚持打防并举、预防为主，统筹开展扫黑除恶、“云剑”、“净网”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深入推进经济金融风险预警研判“防风林”工程，健全完善打防管控建等措施同步发力、综合作用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坚决守牢“一排底线”。

立足纪律部队要求，着力锻造过硬铁军。提前部署开展党纪党规集中学习，教育引导全警增强党性观念、严守纪律底线，为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奠定思想政治和纪律作风基础。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注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出台修订相关规范性文件，不断提高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始终保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探索建立队伍违纪违法“每月通报、季度研判、半年分析”工作机制，教育引导广大民警辅警在主题教育中更加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努力以铁的纪律打造铁的队伍。

（作者系山东省副省长，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

北宋王安石的七言绝句《题张司业诗》写道：“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诗中提到的苏州司业，为中唐诗人张籍，其原籍苏州，曾任国子司业一职，故被称为苏州司业。王安石之所以作此诗，是因收到同朝为官的钱公辅刊印的《木铎集》，读该集所载的张籍诗后，王安石有感而发，表达了对张籍之诗的无比赞赏，也发出了对其幕后付出的感慨，说张籍的诗久负盛名、闻名遐迩，文字表面看似寻常无奇、质朴平实，实则独特不凡、自成一体，写成这样的诗看似容易，背后却需苦心推敲、呕心沥血，付出异于常人的艰辛努力。

“看似寻常”，准确概括了张籍诗歌写实通俗的显著特点。张籍一生多半位卑权轻、处境贫寒、生活清苦，这种生平经历造就了他的诗歌关注百姓疾苦，对底层群众充满人文关怀，其代表作《野老歌》《征妇怨》《樵客吟》《凉州词》等，多取材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反映民生凋敝的社会现象。在语言风格方面，张籍常用白描手法，用辞通俗平实、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读后却动人心魄、发人深思、令人警醒。对张籍的写实之风，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提到，“张君何者为？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张籍好友韩愈也曾作《醉赠张秘书》，说“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来赞美张籍之诗辞意平淡、不作雕饰，但浅而不俚、质而不野，这也正是张籍诗“言浅”却“意深”、“寻常”却“奇崛”的“妙入神”之处。

张籍成诗之艰辛，不仅仅在于其文字本身，更在于其推动诗风改革、开诗学思潮转向之先所付出的努力。盛唐之后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让唐朝迅速由盛转衰，进入中唐，但在唐宪宗努力下，国家出现“中兴”气象。文变染乎世情，此时的文人主动承担文化服务社会变革的历史责任，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呼吁向盛唐诗圣杜甫学习，自此开启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进程。张籍与其一生的挚友王建，就是这批诗人中最早的开拓者、先行者。他们的诗歌风格均有尚实、尚俗、质朴通达的共同特点，两人之诗被并称为“张籍王建体”。他们二人从人文关怀出发，提倡质朴真切、浅近通俗的艺术风格，强调诗歌针砭时弊、讽喻时事的作用，推动诗文从浪漫回归平实、由华丽回归平淡。明代文艺批评家胡应麟在《诗薮》中曾对“张籍王建体”评价说，“张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实”。明代诗论家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叙》中也提到，“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此处的“张王乐府”亦指张籍、王建，因两人大量创造“乐府诗”，而被后人称为“张王乐府”。从文学史角度看，张王二人紧贴时代思潮流发展大势，冲破历史枷锁，大力推动诗文改革，强调诗歌讽喻作用，提倡质实真切、浅近晓畅的艺术风格。他们上接开盛唐写实先风的杜甫，下启把写实之风推向高潮的元稹、白居易，成为新乐府运动的先锋人物，引领了一个时代。

放眼文学史，文风变革自古以来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充满了曲折与艰辛，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成功者少、失败者多。六朝以来无文不骈、无语不偶，骈文走入了形式主义的极端，西魏的宇文泰和苏绰，隋代的杨坚和李谔，都曾反对艳丽浮靡的“今文”，推行《尚书》式的“古文”，但最终都归于失败。一代名相魏征崇尚疏直急切、辞无枝叶、深厚尔雅的文风，数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梁陈骈文文体浮夸奢靡、空洞繁缛、华而不实文风的厌恶，他率先垂范，其奏疏一扫六朝浮华余习，明简质实、通俗畅达，被后人视为楷模。与张籍同期的韩愈引领的古文运动也是历尽艰辛、为数不多的彪炳文学史的案例。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中唐文人，受当时社会变革影响，在散文领域开展文学争鸣、融骈入散，确立了奇句单行、自由灵活的古体散文在文坛中的统治地位，被苏东坡称赞“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为我国古典散文的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王安石用“艰辛”二字感慨张



□ 韩燕丽

籍作诗背后所付出的艰难与辛苦，也意在指出历代诗人之不易。诗歌作为最精妙的语言，自古以来都需要煞费苦心谋篇布局、反复推敲锤字炼句。陆游曾在《文章》一诗中写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说文章天然而成，但作诗炼字相较于其他文体，绝非易事，古往今来都需精益求精、锤字炼句、煞费苦心、谋篇布局。作诗苦，首先就苦在字斟句酌却常常不尽如人意，张籍好友贾岛曾写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种看似夸张的说法既是作者亲身经历无数次遣词造句后心力交瘁的感慨，也是无数诗人对文字千锤百炼苦思夜想的艰辛写照。也难怪李白作《戏赠杜甫》说，“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尽管是大家名家，依旧要饱受字斟句酌、行文运思的作诗之苦。

细看“艰辛”二字，抑或作者王安石对自己一生冲破重重阻力、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所发出的感慨与共鸣。王安石21岁入仕为官，第二年便亲历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虽目睹新政在贵族官僚激烈反对下偃旗息鼓，但未打消其改革之志，几年后写下“不畏浮云遮望眼”，表达自己立志革新的政治抱负。及宋神宗即位，王安石于49岁获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背负“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的期望，确立起富国强兵之策，一度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纵观历史，无论是历朝历代的文风革新，还是历史长河中的社会变革，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只会坐失良机，发展的潮流永远滚滚向前、永不停歇，只有保持义无反顾之劲头，付出“艰辛”笃行之努力，方能取得“奇崛”之成就。

